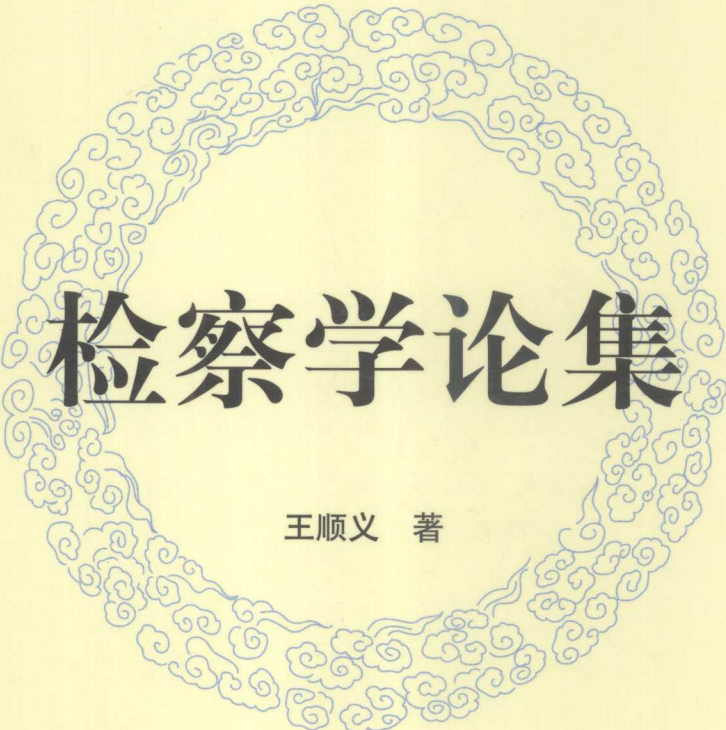




检察学论集

王顺义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013055332

D926.34

17

检察学论集

王顺义 著



北航

C1663440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D926.34

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检察学论集 / 王顺义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5

ISBN 978 - 7 - 5118 - 4981 - 6

I. ①检… II. ①王… III. ①检察学—中国—文集
IV. ①D926.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5652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许 睿

装帧设计/李 瞻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法规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吕亚莉

开本/A5

印张/8.875 字数/235 千

版本/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981 - 6

定价:2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学科的秩序——关于检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原版序

陈兴良

王顺义的大作《学科的秩序——关于检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即将出版,作者邀我作序。我颇为犹豫,主要是我对检察学理论并不熟悉。使我答应作序的是本书的书名——学科的秩序。这是一个十分学术化的书名,令人眼前一亮,勾引起我对该书的阅读兴趣。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以学科形式而存在的,这样一种对知识的制度化安排,其特点是分门别类,由此形成所谓学科的秩序。在学科已经秩序化或者制度化的情况下,新学科要想在知识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虽然新学科不断地产生,但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并不多。本书是以检察学的基本问题为线索的,当然,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仅仅对检察学基本问题展开讨论,而是要为检察学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找到其安身立命的位置。对于这一努力,我是十分敬佩的。确实,一门学科如果不能获得其在学科中的体系性地位,是难以长久的。

检察学,与之相关的还有审判学、律师学与警察学(公安学)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课题,投入的学术资源也不少,数十年前就已经出版了检察学的著作。但为什么现在仍然要为检察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继续论证呢?这一点是令人深思的。检察学是以检察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检察学如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划清界限。因为宪法中涉及对检察制度的规定,

检察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刑事诉讼法也涉及对检察机关诉讼职能的规定,因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学对检察制度的研究就可能与宪法、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重合。当然,也有部分内容是与宪法、刑事诉讼法不会完全重合的,这就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它们是对检察机关和人员所作的具体化规定。就此而言,对检察机关的专门研究还是必要的。以往的检察学之所以未能独立,主要还是与其他法学学科发生了过多重合,因而难以在知识上自立。本书力图构建一个检察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理论检察学、应用检察学和检察史学这三个分支学科。理论检察学又包括检察学原理、比较检察学、检察学概论、检察制度概论等。应用检察学包括实务类理论、职务犯罪侦查理论、狱政检察理论等。检察史学既是检察学的分支,也是一门法制史学科,包括检察制度沿革史、法律监督思想史等。从以上叙述来看,可谓学科结构十分宏大,由此形成的检察学知识体系蔚为大观。作者的想象力是令人敬佩的。相对于以往的小检察学体系,这是一个大检察学体系。

当然,对于作者的这一构思,我还是存在一些疑问。归根到底还是涉及问题、知识与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形成知识,而这种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学科。学科一旦形成,对知识的发展起到某种制约作用。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问题是到处存在的,对问题的思考也是每时每刻发生的,但对问题的思考未必都能形成知识,因为知识是对问题,尤其是宏大问题与根本问题的追根刨底的思考,甚至是形而上的思考。知识不同于经验,尽管知识来源于经验,但它必定已经是上升到理性的程度。与此同时,知识的积累也未必一定能够形成学科。因为学科是自身规律的反映,它是为知识划分疆界的。中国古人云: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只有“道”才能形成学科性知识,而“器”则只能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承认经验性知识这个概念,但这种知识是永远不可能上升为学科的,因为它具有个体性、体验性,有时它是难以描述、难以评价的。我记得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经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故的徐立根教授请教过关于大学法学教育

中从侦查学到物证技术学的转变。徐立根教授是我国物证技术学的创始人,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令我茅塞顿开。徐立根教授说,侦查活动是一种经验活动,尽管侦查过程中需要各种专门知识,但侦查学在大学中是很难传授的。而物证技术学是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对物证进行科学研究,因而它作为一门学科,是可以在大学中传授的。我对徐立根教授的上述见解深表赞同。有些知识的教研活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但须对学院有一个限定,例如侦查学一般在公安大学之类的院校开设。有些实践活动的研究可以形成某种专门的学问,例如对“刑事辩护”进行研究可以形成辩护学,但它不可能是一门学科。换言之,不是加上后缀——“学”就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学科是与大学教育紧密相连的,只有通过大学教育传播的知识才能形成一门学科。

王顺义长期以来从事检察工作,对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有自己的体验,试图建构宏大的检察学学科体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本书对此的论证,尤其从学科的秩序所作的论证,表明作者具有相当的学术眼界。尽管我不完全同意王顺义的某些观点,但我还是衷心期望王顺义的学术努力有所成就。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2010年6月11日

知识的改造:中国社会 30 年变迁 图景下的学科前沿(代前言)

一

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在《词与物》的开头引用了一个寓言家写的一则笑话,“有一本中国的百科全书,把动物分为这样几类:(a)属于皇帝的;(b)涂有香料的;(c)温顺的;(d)乳猪类;(e)海牛类动物;(f)寓言中的;(g)离群的狗;(h)包括在本类中的;(i)疯狂的;(j)不可数的;(k)拖有细细的驼毛尾巴的;(l)除此之外的;(m)刚出水的;(n)从远处看像苍蝇的。”西方人对此感到好笑,他们是在笑中国人吗?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对此感到好笑。这好像还不是揶揄中国古人学问分类最早的笑话。就是时下,也有人仍然对中国的文化知识颇多异说。改革后期,多出于人们视线的中西启蒙对话中外国学者常怀一种心态:“你们未启蒙,我们来启蒙你们。”以至在国际社会有关文化比较研究圈,欧洲本位、美国本位、东方本位的争论各个国家的学者和论点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东日本大地震后,有一个颇有一份忧天样子的日本学者说,他担忧中国这样走下去会成为“低智商社会”。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启蒙?从历史的来龙和去脉看,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身后总是背着一大堆政治因素和外夷骚乱一类的东西。实际上,文化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知识观念上的关于自由的信仰。人类文明的过程看似一个不断推倒文化壁垒的过程,而这种文明演进有时成了人种征服。一个民族还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尽管近代钱穆先

生就说过,“学术本无国界”,然我自以为,所谓国学是文化模式上的一种相对主义。章炳麟先生说得再好不过了,“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立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³⁰年后,也就是1916年的那个冬日又有人说了类似的话,“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是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①这就是历史一直没有敢忘的蔡元培先生。

国内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潘永祥教授主编的《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说,我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都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大多数学科后来发展停滞,衰落了。在西方近代科技传入以后逐步为其代替。^②这种说法应该是能够为当今学界所接受的。亦有论者认为,中国自古不区分科学与文学,以至蔡元培先生主张“学术分校”时出现的实用文、艺术文分类。而在文化领域,中国古代文化在体系性建构方面显得苍白。一些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文论中只有刘勰一人在《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体系性建构的高度,而这种空前绝后的体系性建构又恰是由于刘勰借鉴了印度宗教的逻辑思维方式的结果。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在证据的充分性上存在问题。“中国的学术发展如从西周‘学在官府’算起,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③被现代社会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北部诞生时,其确切的公元纪年是1088年,而能够代表中国医学先构的《黄帝内经》在此时就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到今中医学已为中国政府列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一门原创性学科。中国历史上,知识传承有着悠远而可追溯的渊源和可考的史实文献。据《礼记》记载,早在夏商时期,“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

① 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② 潘永祥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③ 徐寒主编:《二十四史精华》(第一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页。

左,大学在郊。”东汉郑玄注曰:“此小学大学殷之制。”继而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①郑玄注释,上庠、东序和右学三种为大学,下庠、西序、左学三种为小学。大学就是国学,固养国老;小学就是乡学,固养庶老。又说,“瞽宗,殷学也。”^②瞽宗就是商代的大学。西周时朝廷的辟雍,诸侯掌管的泮宫;汉代以来的太学、国之监以及散布于城垣的官学、乡学等学坊都还不足以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大学校。而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发生的一个文化节点,即春秋时期中国古人的学问科目之分。据《论语》记载,孔子教授弟子就把教育科目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按不同人的天性、才能加以教导因人而异授业,并把“礼乐”作为区分先后进入社会的文明标志。^③晋唐之后则有了相对进步的算学、律学、医学,并进入官学、私学有了相当的规模。然从周秦到南北朝,这一相对宽松自由的中国文化史发展时期,儒、道、佛诸学各流并行,诸子进相竞立、百家鼓而争鸣,仅儒家就有孔、孟、荀三派鼎立,学科分目终究不能长成大气候,而在学问与“人格道德”无可分割的文化演进与夹杂之间微弱丛生。所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学问分类,自上古先哲诸子百家以来,及至汉刘向、刘歆的《七略》把书籍分为六类,即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诸子就是哲学政治学说,兵书就是军事学……体系性的问题肯定有,但这些确实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只是其时社会已即“儒术独尊”,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之后不能不受到影响。按照控制论的观点,中国古代学术就是一个大体系,这是一个国史问题。我想,有两个人是能说清这个问题的。那就是毛泽东和傅斯年。在中国历史上对学科分类问题深省的是新文化运动时的一员主将傅斯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谬误》,发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的猛吼。抨击中国历史上学科分类是以人划界,不是以学为

① 《礼记·王制》。

② 《礼记·明堂位》。

③ 《论语·先进篇》。

科。比如“诸子”就不能把诸子思想对立与一致分开。之后大学堂教学科目的技艺类、政法类等学科分类不能说不受其影响。后来,毛泽东大手一挥,“那就是新学与旧学”,诗人一般气质把历史划开了。历史与现状之间的逻辑是民族习俗进化,中西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冲突不能遮盖中西学术合璧的文化意义。因此,决然地把意识形态与哲学史混同,或者相反而绝对地割开,这些立论注定要被颠覆或遭遇批判意义上的解构。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的一道历史分野,带到人们生活方式之中学术景况的变化,既是革命性的变革,也是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学科建设史表征了这一文化场。以20世纪早期为界,中国文化科学的走向映现出一道寓含嬗变、演进的系谱。中国学术史自滥觞于夏商西周以来的上古学术,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由秦至清断朝代泱泱大国封建文化的“经学”绵延,遗落着宗族社会和家族社会时期告别了茹毛饮血年月人们思想爬行与决斗的历史碎片。及至近现代,新学国学的转型和变革,奠定了三千多年中国史上的学术基础。中国历史长河中显要的医学、太极学说、朴学、史学、理学、书学史琳琅满目,以至如同乾嘉学者们的蓝翎顶戴长袍马褂一般古色古香而求学切理光耀其间;一边是19世纪以前西学东渐的文化观照,有学问们的认同与崇尚,也有青年学派的拒绝与抵制,以至映照出翻译科学下文化的变迁。中西文化不是一个血统,而人类文化有没有共同的基因?进化史、天文学、人类学以至社会学一类学科的引介以及诸科学的逻辑方法、系统论方法、语源学方法徐徐东来,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华夏大地上激起中西文化交融的轩然大波。异文化的对流引发了科学界的革命,方法论上的调整和更新,研究范式的批判与扬弃,本土科学的理论传统与舶来品的交汇、整合与重新划定边界,对于每一现象领域结构与发生学意义的反思,使得东方学科融进了西方学科方法和新学理,一些学科在科学浪潮中陶冶,一些学科的支脉在重组中分崩离析,社会的开化和研究传统的变化使本土文化自觉融进了学科意识,检验了中国文化学科化的独特性,日臻完善了中国大多数知识体系的学科地位。沈家本、王国维、章炳麟、钱穆、陈垣、顾颉刚、陈寅恪、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如同一道中国史璀璨

于世。科学的革命，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爆发了旷古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由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同封建主义形成决然对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史上发生的一场启蒙运动，当然它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更不可能提出民主政治的具体方法，但其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思想启蒙。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只能是一种前现代性。放大看，三千多年中国社会文化科学的传统，不论是在整体论意义上的文化科学而言还是任一系统的某个领域分析，都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社会转型、价值变迁不无关联。其历史进程在形式上大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夏商西周以来漫长的几千年上古学术文化，是以“汉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融合，部落文化交错，融合与冲突并存。春秋末年，礼乐崩坏，儒分为八，人们思想混乱，七雄逐鹿天下。孔子一死，其思想体系也随之而崩溃了。^① 随后仍是封建王朝主导的四分五裂中的“汉化”，“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② 直至汉代董仲舒政治上推行“独尊儒术”，学术上的《春秋》“三传”即后世的“公羊学”，到北魏拓跋宏时期民族文化习俗大融合，以至鸦片战争以后变法思潮兴起的清末改制。中国古代学术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政治科学就是朝纲、“子曰”，《贞观政要》即“帝王之学”。发生在中国古代史上物质与精神构筑，学著《黄帝内经》、《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等，以至万里长城、大运河、四大发明……见证了几千年华夏的早期文明；二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冲击，以及引发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真正的启蒙运动，西方国家有恃坚船利炮以征服者君临天下的神态给近代中国的百年耻辱，以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兴起。在本文的意义上，傅斯年的声音是超前的，不然人家有“光学”、“力学”和“化学”，我们还是“孔子”、“孟子”和“老子”？三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其客观性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一时期，学术理论研究尚处在基础阶段，以至到20

① 《韩非子·显学》。

② 《孟子·梁惠王上》。

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承认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就说明了这一点；^①四是在向苏俄学习上的盲目移植，全盘“苏化”。30年中国法学工作者展开检察学检讨，就可看清这一点；五是“文革”负面影响，科学文化进程流向改道或夭折，文化结构被扭曲；六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科学文化奔腾激越波澜壮阔的文化思潮。^②

关于知识的体系性研究，西方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外国人在中国30多年的开放中似乎已看清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现状的知识状态。实际上，这种认知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象。而西方的学科建设，从历史上看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罗素是将“中国”作为一个问题较早系统研究过的西方人，他的《中国问题》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中国问题应归结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类别，其中文化问题最为重要。^③用今天的眼光看，文化问题仍然成问题。还有的哲学家的立论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种“启蒙”。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把犹太人的割礼和被他称作“中国古人”头上的辫子同属于民族标记归类（显然他对中国民族史就没看全）。弗朗西斯·培根的“新方法”将当时的学问分为优雅的、空想的、论辩的三类，片面性的谬误的渊藪在于其认识的局限性。就连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6卷）中所提出的天体物理学和社会物理学完成的“观察科学系统”，仍然是一种不很彻底的东西。至于亚里士多德当年把当今作为中国国策的“节制生育”归类于他当时的巨著《政治学》，当然是需要再讨论的议题。有的被西方人炒作的预言性经典则往往让人们看到原本的事实，有的作品突然使人看不清著作思考的路线。真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探寻与顿悟的过程之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2008年，《人民日报》开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专栏，陆续推出30年各门学科随中国社会变迁在改革开放实践沃土上生发和长足发展的介绍，见证了这一学术景象。同时期在京各大报刊、地方各社会科学院报及学报同时向社会报告了这些研究成果，都说明了这一点。

③ [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中各个民族又有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节点回望，中国社会确实走了好远。中国人用了3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的路程。然而，30年间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理论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进步？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发生于当代中国极具启蒙意义的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社会思潮——直接地影响了之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的延伸、所有制更新、行政体制改革推开……自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不会忘记1973年后教育政策的“松动”以及折射到社会的新气象，不会忘记中国社会开始“解冻”时的那件事。

1977年夏天那个闷热的黄昏，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凝固般地站在大街小巷的屋檐下、电线杆下收听有线广播站播出高考制度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欢呼雀跃。人群里的青年们，返乡的、插队的，忘形地把下地归来的草帽甚至水田里做活的高腰雨鞋扔了起来……那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的。

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一反传统结构的拿来主义倾向，开始探寻一种“革命的革命”的深层次变革。马克思主义是经由“苏俄”这一被西方学者称作历史“偶然性事件”的政治实体“送来”的——不管现在的俄罗斯人是抱憾还是认同这种立场，也暂勿论现在这个世界上站在柏林墙下的历史学家怎样来认识这一历史事件，而中肯地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当时新中国的立国和建设部分都是应该被写入国史的。30年后，中国人无情——理性地批判了它。明显的社会表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现实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应该是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个人物质财富由螺旋状上升至“涌流”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把人解释为一种机械性工具的生命哲学而企图整个社会的普适性并以此来取代理性和道德是一种极端。在这一历史图景下，映现到人们现实生活中来是一种理性的社会反思。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同志曾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到苏联“取经”，对苏联的政体、机构设

置和科研制度都有所借鉴。而其时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西学学科已在社会改造陶冶中融入中国理论传统,并已步入大学殿堂。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疆域内的主流文化“移植”的成分是可以想象的。科研领域和学界基本接受了这种教学现状,并得到改进,但1952年始,人类学一些学科又被当做“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撤销,以原学科为研究方向的学者都改行,成了民族学研究的主力军。相继——新中国国史上那一段让知识分子铭心刻骨的叫做“文革”的日子到来了。其发生在1966年的5月16日,是教育界、文化界的灾难,知识界的浩劫。红色江山一片红色海洋,人们的精神穷得只有八分钱看八场革命样板戏,也就是流落到海外的知识分子所说的“8亿人看8场电影的文化沙漠年月”。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各门学科才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得到恢复重建。应对中国社会遽然而至的历史变革,广大科学工作者纷纷投入到科学革命的社会变革洪流之中。对于这种时空转换性的检讨,我在一篇论文中讨论学科的起点时提出,“有关逻辑概念、范畴分类等一些学术规范的基础知识是从古代西方哲学发展而来的,我国上古以来的文化虽然璀璨于史,但侧重于经学、蒙学等科目学问分类,西方后现代主义一些学者也承认卡尔·马克思颠覆了作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重镇的‘形而上学’,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我国时其已经成为用来改造世界的专门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史哲研究也基本是组装以后的读本。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各门学科随社会实践发展和需求的不断兴起和涌现,科学研究才有了丰富多样与今天的空前繁荣。”^①

变革首先是从实践领域发生的。它不仅仅是因应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回声,而同时满足于整个社会改革的物质需求。中国学者打破沉寂,欢欣告别“文革”以来赢政式的知识分子政策,摈弃入主出奴党同伐异的学阀之风和肤浅,在元哲学的境地探索知识的本质。

^① 王顺义:《学科的秩序——关于检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关于“颠覆‘形而上学’”,更早一些说,海德格尔在西方“五月风暴”爆发前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对于中国社会进程上“二次革命”出现的制度本原以及所引发的种种质疑，理论界异军突起、思想对立。围绕政治科学的哲学理论和作为社会学起点的制度本原问题，一些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中国学者顽强地站在社会主义学术阵地上，在事关民族国家重大理论是非的原则问题上，以事物自身固有规律提出逻辑性论据。作为代表真理的中国式学科体系在改革实践的沃土上成长起来，中国问题在广袤社会领域得到结构与发生学意义上的阐释。一些理论传统在批判之中重新划定边界，一些学科研究范式得到猛力批判和无情刷洗，代表了这一时期科学前沿的学科趋势和学术方向，也使新生的中国学科完成了检讨意义上的理论检视。哲学界，中国马克思青年学派燃起无限的思想光焰，试图用社会主义的目的论与社会哲学和发展哲学来对自己进行修正和补充，而且对不同社会制度中类似的经济概念作以比较性描述，由哲学领域出发探索社会学概念与其他领域的文化关系，唯物史观被增进新的解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管理科学的恢复重建，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以至人体科学种种分支科学学科架构的勾勒描绘，因循它们的历史事实、已有事实、未来事实维护它们存在的权利，也在批判并试图推倒它们的有关前提和假定。经验科学在试验中得到检验，理论科学在思辨推理中得到实践确立。学者们在反思以往学科传统上对知识体系重组整合，在跨学科的拷问之际跨越文化的界河，在30年社会转型大变革的中国大地上腾升起一道宏大的科学气象。高山景行，流水行云，人们高歌“科学的春天”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寻找共识，置身于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进程，华夏大地上激起轩天的科学浪潮。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高度分化，交互渗透。科学分类越分越细，学科综合日臻趋密，所有学科的延伸越来越长，原来分头描述或揭示各个现象领域的学科，正在系统科学的高度相互结合，各门学科都已不满足于概略的“关于起源的考察”，而在重新开始追溯自己生命的始祖，创立自身的历史学，开拓学科的未来学，科学界又一场新的革命性突破寓示将要来临。现代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使反映文化的学科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世界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庞大繁杂又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人们不仅创立、丰富了各类新科学，而且创立了科学学。据上海有关社

科部门1982年统计,各类学科分科已有2000多种。另据有关学术部门数据,1900年是500门学科,2000年是5000门。100年间增加了10倍。在一定意义上,“学科”既是“科学”,又不能简单地混同于广义上的“科学”,既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其必要性而创建的,但又是以某一现象领域的特殊矛盾性之应然为科学前提而兴起;既反映了部门科学矛盾着的事物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的理论特征,又折射了某一学科整个科学渊源的原创文化视野。管理学跳跃于激越、迸发和充满竞争的时代科学间,为今天的多学科注入管理哲学内涵,也为时势辈出的人们跨学科工作提供知识指引。这种再分类的分合大潮浓重的缩影隐没在20世纪身后悄声步入又一个千年。“在当代中国自然和社会科学30年的发展中,有的学科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在一些高校学科专业广泛普及,已经发展为一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多种研究方向的统筹配置,呈现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梯次清晰,学院(系)设置完备及MPA教育蓬勃发展。包括法学各部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经济社会史、法律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得到了长足发展。”^①

科学的历史传承是它的哲学形态重新逻辑化问题,而每一学科都有着其规定性的逻辑与历史起点,亦即质的规定性。科学必然反映由实践而来的知识形态,要求人们在无限大或无限小的系统领域里发现、确立其基本范畴。这是学科建设最一般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以后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是”(或存在)与“物质”的学术立场不应存在排他。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决然对立还应该再从方法论立场上去考察,这里不存在康德主义或任何调和主义。一门学科在前提上应意识到它的出发点和目的论。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集中到一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基本的思想方法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任一分支学科的社会实践所证明。知识体系当然涵盖思想体系。学科建设以及投入应用研究的事

① 王顺义:《学科的秩序——关于检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实说明学术文化无疑影响社会进程,30年科学史折射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历史大转变的社会缩影,也不难看出夹杂有官员腐化、学术腐败泥沙俱下的社会气息里或缺一种辩证性批判。

这样,我把目光停顿在中西几千年的文化脉络与当代现实及发展趋势的范畴,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观点找出路。

三

目前,在推进我国的学科建设中国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蕴涵民族复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目的,从历史的脉络作纵向分析,学科是分不同的历史概念的,在研究上也是分不同层次的,从而决定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可或缺的范畴研究,只有搞清一国的历史事实、社会事实,才能确定某一国家、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在操作层面,大多学科的对象都望名可知。比方说,动物学是研究动物的,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气象学是研究气象的……检察学呢?检察学的研究对象肯定是检察制度。而检察学在中国的研究呢?很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无论是静态的规范还是动态的法治现象必定是法律监督这一特质。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在方法上的物质体现。19世纪,黑格尔提出了这一原则方法,这是对人类的贡献。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也正如他提出了辩证法而在实际中反道行之一般,必然陷于唯心主义的窠臼。因此,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在知识体系的架构上考察核心范畴与研究对象学理关系的存在,搞清楚它们的逻辑与历史内在的必然性联系。正是从这里出发,对于改革开放中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讨论,我以为“现代性”也不是直接从李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那里拿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应是指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类问题,正像一些史学家所共识的,王朝初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是比较适应的,但到了晚期,“便出现思想混乱、纲纪崩坏、小人麀集官场、理想主义儒